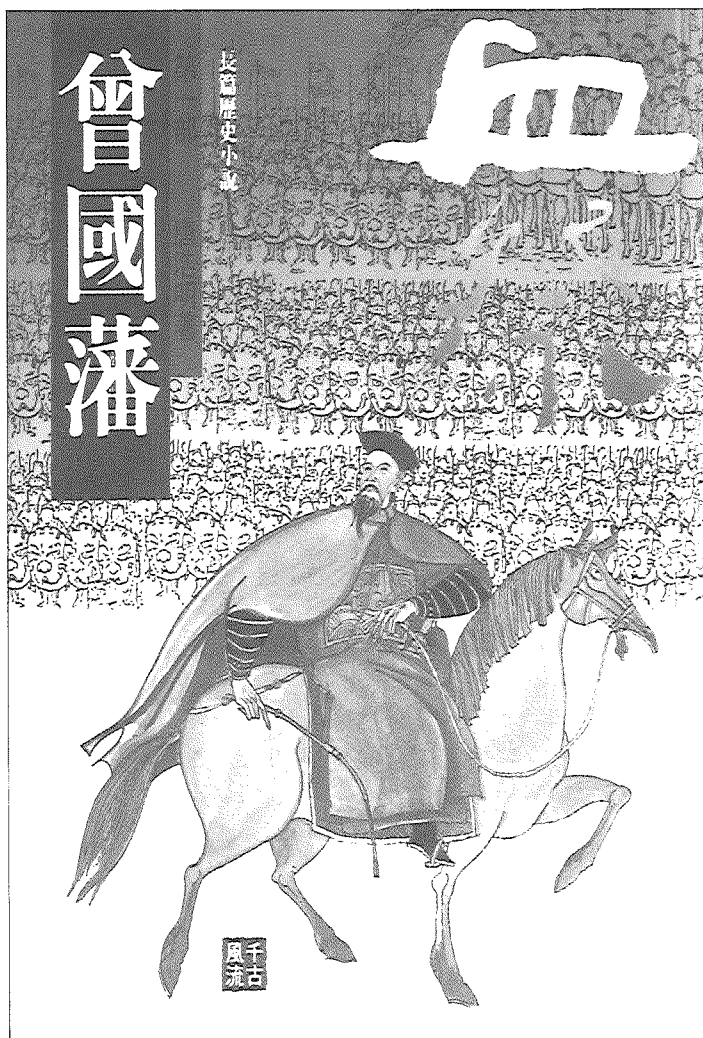


隨筆·觀察

## 我看《曾國藩》現象

◎ 楊念群



曾國藩，劊子手耶？聖人耶？大陸官場近日終於透出了反常的信息，曰：莫爭論！在慣常用二分法的鬥爭哲學詮釋歷史人物的傳統語境中，此音的發出尤如天籟之聲。有消息為證，長篇小說《曾國藩》印行早已突破百萬大關，幾成為海峽兩岸政界要人的資治寶鑑，以致市井新俚語又添一聯云：「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看《胡雪巖》。」時人喜用「現象」一辭概言某一流行趨勢，與「後現代」、「後文化」等時髦歐化語言相映成趣，《曾國藩》的暢銷似也可視為一種文化潮流式的「現象」，只不過此「現象」與眾多同類詞義相比，實有更為深沉的歷史意蘊。

從淺層的意義上看，「曾國藩現象」的發生，是目前小攤上流行之《厚黑學》之類的中國式人生警語的延伸和放大：從深層角度看，它又確能超越傳統譴責小說中描寫的面孔可憎的市儈式官吏形象，從而以「正劇」塑造

的方式把曾國藩的閱歷人生濃縮為晚清官場權術學的現代文學教本。以此標準衡量，我們可姑且稱之為「後《厚黑學》現象」。

曾國藩再次被輿論炒熱，當然首先在於其自身擁有眩人耳目的傳奇經歷，但其所以傳奇，又恰恰並不在於他是清廷的「中興名臣」。千古以來，帝王將相多得很，恐怕無幾人有緣被爆炒至如此程度。曾國藩的魅力，乃是在於他一度超越自身而變成了一種吸攝力十分強大的凝聚符號，以他為首的近代湘人群體在短時期內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從默默無聞於衢巷的布衣到控馭清廷政治軸心的封疆大吏，形成幾乎涵蓋整個晚清政治體系的權力統攝之網。更關鍵的是，湘人政治網絡的迅速形成，並非延循正統官場的遊戲規則，從而把官場升降之秩序實實在在地變成了一種「例外」。這種「例外」恰恰又不是僅僅憑恃「厚黑」二字訣的權力火併術，而是有相當深厚的學理資源作為運思與進階的背景，這足以使欽定的科舉規條形同具文，使《厚黑學》中的鬼詐之計變成了鄙俗不堪的「小兒科」。前不久，與作者唐浩明先生座談，唐氏述及在台灣任高級官員的父親曾告訴他，真正的官場風雲人物絕不可能像《官場現形記》裏描寫的那樣委瑣不堪地咬耳朵、打小報告，而是有一套嚴密有效的運行規則，這一點曾文正的識見最讓人欽羨。語雖不多，卻頗待人回味。

「曾國藩現象」之所以「後」於「《厚黑學》現象」，尚在於曾氏魅力中蘊藏有權力社會學式的大智慧，凡世塵囂中的大圓融。這種智慧既不同於農民反叛式的狡黠，武夫征戰式的愚勇，

與市井小慧式的狹隘，而是酷似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正面為百試不爽的朱子學——湘學的「道統」鋒刃，時常砍削着湘人心靈中的異端「毒草」，從「同治中興」式的「昇平氣象」中似可窺見其衛道一脈的苦衷；反面卻為霸道縱橫式的權謀機變提供了最銳利的武器，甚至到了民初軍閥割據、亂象疊生之時，曾國藩這把利劍的反面寒光仍在籠罩着群雄爭競的政界。曾國藩一生境遇及其影響正是應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句古語識言式的悖論。

曾國藩的幽靈之所以能夠定期呼喚人們為之過一次「復活節」（如晚清、民國、當代，曾經流行過三次「曾國藩熱」），也恰恰在於他是個工於心計的「悖論大師」。在晚清瞬息萬變的官場上，如果僅是個老朽式的古董衛道士，是為庸才，無人搭理；如果總以反叛之姿標新立異挑起刺激，是為異端，則難入主流。而曾國藩身上常是「王氣」與「霸氣」並存，既有「衛道驅邪」式的堅定執着，又有縱橫捭闔式的靈活功利。在他手裏，「書生論劍」、「紙上談兵」這些專開文人玩笑的典故，逐漸翻新為一段段傳奇般撼人心魄的真實故事。

那麼，「悖論大師」曾國藩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屢次「復活」，其內涵究竟有何差異？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如前所述，「曾國藩熱」大致在歷史上發生過三次。晚清士子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譽之，塑其為古典式的「內聖外王」標準偶像；民國時蔣中正以《曾胡治兵語錄》自律，但只是襲其皮毛，而疏離其精神，頗有臨時抱佛腳之嫌。青年毛澤東獨服同

鄉曾文正，則是大有深意之舉，似應仔細加以分疏。我覺得曾國藩的三次「復活」中，以民國時期最值得深究，其中毛澤東與這位從未照過面的同鄉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最能發掘出曾氏形象的新意。這裏面當然有一種區域傳承的背景在，而「毛澤東熱」與「曾國藩熱」幾乎首尾相銜，93至94年幾乎成為「湖南鄉賢崇拜情結」的釋放年，就更值得深思。所以我們透視「曾國藩現象」，就不能僅僅把它設定在當代人的心態語境中，而必須持有一個區域傳承的歷史時空觀。

我們可以看出，同為湘人的曾國藩與毛澤東，至少在三個層面上的思維是同構的，並與所謂「厚黑學」式的世俗官場箴言頗為異趣。其一是曾國藩頭腦中存有強烈的「反智論」傾向，這種「反智論」與粵人陳白沙與浙人王陽明的棄經書不觀，唯恃靜坐以觀心動的浪漫主義式的反智表徵頗有不同。湘人往往認為不存在有超越於倫理制約之外的學問，學問是道德的化身與體現，否則就毫無用處；也不存在無法對象化於踐履行為的純粹性思想活動，哪怕是相當純粹的吟詩作賦式的宴集活動都要遭到譏諷。曾國藩說：「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明德、新民、止至善）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家書》）脫離了道德軌迹的制約就不叫學問，此論雖與「心學」的典型「反智論」不同，但對「知識」的獨立價值予以否認卻是共通的。晚清湖南有蘭林詞社，其中活躍着所謂湘中五子，風流文采，傾動一時，於是即遭曾國藩之友羅澤南的攻訐，貶為

「文人浮薄」之舉。曾國藩在總結自己的政治生涯得失時，多次表示寧以「愚人」自居，在面臨「德」與「才」的選擇時，曾國藩則寧可取其前者，認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最後一句話很重要，這種「道德人」定位已注定了湖南在近代出不了能擺脫道德理性控馭的、較純粹意義上的大學問家。道理非常明顯，大學問家極有可能放浪形骸，不中規矩，而「道德人」卻也很可能是學問上的庸才，這就像西方的某些大學者是蔑視日常倫理的「同性戀」者，或是處世品行猥瑣無足道之人，卻絲毫遮掩不住其學問上的耀眼光輝一樣。

其二，近代湘人過於發達的「政治思維」，使他們頭腦中有一個根深柢固的信念，那就是「知識」、「學術」的最佳成果，應是在政治領域裏體現出來。換言之，「知識」的價值必須與「政治」掛上鉤才有意義，否則就是空洞無用之學。以「有用」與「無用」做為衡量學術價值的標準，倒並非湘人的發明，而是古典傳統的思想化石。但這一思路無疑在曾國藩等人的行為及話語中達到了極致狀態。左宗棠更言通經如不能致用，或不能「識得一字即行一字」，則「所行不逮一村農野夫，乃能言之鸚鵡耳」（《家書》）。不管是「鸚鵡」還是「牧豬奴」，相當一部分是給純粹學問家扣的大帽子。曾國藩等人慣用的湖南思維模式對後世的影響之巨實難以估測，集中而論就是湘人挾權力之狂飆，把「經世致用」的政治標尺放大泛化為一種涵蓋一切的普遍治學準則。由此，學術的中立價值標準被淹沒在功利政治這片汪洋之

內。當然，湘人的「經世」觀念顯得很寬泛，每個時代都有其核心的指向性內容，它可以是「平叛」、「衛道」和「夷務」，也可以是「救亡」、「維新」與「革命」。不過有一個核心內涵是不會變的，即不存在純粹枯坐書齋搞出的真學問，學術的生命力體現於變幻不定的政治風雲中。這使我想起當年觀看《青春之歌》時印象極深的余永澤與盧嘉川之間的對立場面，現在回憶起來，雙方實際代表的就是「學術」與「政治」思維的互斥兩極。盧嘉川斷言學術必須和風雲疊起的政治搏殺抹平界限，同結連理，自覺消解其獨立的立場。余永澤則是自覺地持有淡漠政治的態度，拼命掘深「政治」與「學術」之間的塹溝。余、盧之爭當然有傳統的思想根基在，但是在湖南人居於近現代政治舞台軸心地位的境況下，盧嘉川思維的優勢地位也可視之為「湖南模式」蘊育而成之權力鏈條中的一環。

其三，近世湘人不甘於純粹文人地位的躁動心靈，多少源於湘學歷史中之「非學者化」取向。湘學鼻祖中不少人大言「器」、「道」界線不分，以探「器」為揚「道」之階。他們認為，單純追求所謂「道」是無意義的，是書呆子的表現，學人總是應該幹些學術之外的事來證明自身的價值。比如宋時岳麓書院學子在外族入襲時，同樣會自覺地攜兵刃登城防守；近代左宗棠在醴陵書院當山長，總是帶學生去爬高登低，在書院外的山川大河之上指指點點，講論攻防之策。誠然，讀書人的「非學者化」早在「內聖外王」的儒家命題中就被定勢下來，只是湖湘儒生更偏傾於「外王」意義的闡釋，甚至

把儒家哲學詮釋為權力爭殺或「帝王之學」的範本。於是近代以前，在較純粹的學術意義上，湖南不啻為一片「文化沙漠」。因為無論在科場還是在學界，湘人總是處於湮沒無聞的寂寥之中。於是，咸同後湘人的風光與咸同前湘人的落寞，構成了湘人「自傲」與「自卑」交織心理的一種歷史變奏。近代湘人總有一種文化補償心理，即以政治形象的發達彌補學人缺乏的地區性歷史遺憾，此心理延續到當代社會，就造成了所謂「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因為在湘人的視界裏，50、60年代的知識分子也屬於「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無用文人之列。

由此可知，「曾國藩熱」的蔚然興起，與所謂「湖南模式」的歷史心理淵源有關，它一方面成為傳統權術演練的通俗文學教本，並在極廣泛的範圍內喚醒了當今老百姓中普遍存在之形形色色的強權崇拜意識；另一方面，曾國藩思想模式中的湘學反智傳統，正迎合了轉軌期中國社會群雄割據亂世局面的策略需要。湘人思想結構中世俗智慧的豐富性，如強調知識的實用實戰性的觀點，為法律控馭手段尚不完善的中國市場，提供了頗為豐厚的人際關係戰術運籌資源。這就和《論語》及《孫子兵法》的現代作用在形式上有些相近，只不過因為其反智及權變色彩甚濃，而不如這些典籍富有那樣正規的準學術色彩而已。

楊念群 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